

# 早期中國人編纂的日語教材

— 以《東語簡要》、《東語入門》、《東語正規》為例

陳 娟

The Early Jap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Compiled by Chinese:  
*Dong yu jian yao, Dong yu ru men, and Dong yu zheng gui*

Chen Juan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edited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hree textbooks – *Dongyu jianyao*, *Dongyu rumen* and *Dongyu zhengui* – are analysed as representative development as all three are early exemplars of Japanese textbooks for Chinese students and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purpose behind the study of Japanese. The form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awareness of Japanese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trol over the knowledge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of an increased need for foreign languages, the Chinese editing of a Japanese language book is seen as an inevitable trend. These three textbooks were referred to as examples and sources in later textbooks and were extremely influential.

キーワード：日語教科書 東語 玉燕 陳天麟 唐寶鏢

## 1. 清末日語學習的背景

鴉片戰爭的失利，使中國人認識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性。而西方列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面臨著日益增多的中外交涉，外語人才的培養成為一種必然的需求。但在1862-1894年間，中國人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日語學習，直到1895甲午戰爭失敗後，使中國人的對日觀產生了根本的變化。鑒於日本在地理和文化上均較西方便利，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提倡向日本學習。加上以張之洞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推動，清末掀起了留學日本以及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一時間中國學生赴日留學者絡繹不絕。無論是公費還是自費，是個人還是舉家東渡，留學或是遊歷，這一赴日熱潮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年齡層。留學人數最多的時候為1905年及1906年，曾一度達到約八千人<sup>1)</sup>。然而，如果不通日語，那麼所謂研究日本的經濟和政治，則如同隔靴搔癢。因此，人們漸漸開始瞭解學習日語的重要性，朝廷也開始重

---

1) 實藤惠秀（1970）《增補 中國人日本留學史》くろしお出版社P60

視日語，於1897年在北京及廣州同文館開設“東文館”，即日語課程。這標誌著中國人開始將日語作為一種外語來學習。在外語學習中，教師和教材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亞洲語言第一次作為外語出現在中國人的學習視野中，因此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在這樣的環境下，各種日語教材也應運而生，尤其是出現了許多專為中國人編著的日語教科書。

眾所周知，關於中國人日語學習史的研究，歷來都是從教授者、留學生、學習機構和語言政策及語言觀等方面進行研究的。但是從日語教科書的角度對中國人的日語學習史進行考察的研究並不多。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最早提及清末面向中國人的日語教科書。一直以來關於1945年以前中國人的日語教科書的研究相對較少，近年來也只有劉建雲在《中國人的日語學習史——清末的東文學堂》中整理了清末的日語教科書共計68種，李小蘭在其碩士論文《清末日語教材之研究》中對中國人編纂的24種日語教科書進行了分析。

清朝以前關於日語的記載很多，但都是作為方言收錄在日本研究的相關書籍中，如《書史會要》、《日本考略》、《日本一鑑》等。而清朝關於日語的記載也可以在《吾妻鏡補》和《遊歷日本圖經》等書中見到。然而這些都不是語言學上的日語研究，更不能算作是日語教科書。普遍認為1884年發行的《東語簡要》是第一本由中國人編纂的日語教材。但是，《東語簡要》也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外語教科書，可以稱為“教材”的應該是1895年陳天麟編纂的《東語入門》。從同文館建立日語學科到1900年的三年之間，清人編纂的日語教科書只有這一本《東語入門》。而1900年出版的《東語正規》，則被認為是清人編纂的第一本科學的日語教材。這三本教材是中國人早期學習日語的代表性教科書。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學習日語的目的、方式以及對日語認識的變化，也包括有識之士對日語知識的掌握上的進展。

## 2. 東語簡要

### 2.1 版本和序言

本書現在可看到的原刻本是國立國語研究所藏的大田文庫本，而一般可見的則是收錄於《纂輯日本譯語》<sup>2)</sup>的複刻本。本書為折頁線裝本，一冊，雕版印刻<sup>3)</sup>。18.5×12cm，65張，共計130頁（其中14頁空白）。沒有第13、14兩張，從內容上看應該不是缺失，有可能是印刷錯誤。

扉頁寫有“光緒甲申（1884）首夏”字樣，序言由茂苑浣花生寫於“癸未（1884）仲冬月”，可推測此書的成書年份為1884年。

從序言中可以看出，作者為玉燕居士，生平雖不詳，但曾“久歷東瀛”，應該是掌握了一定日語基礎。序言中“仰見我朝”<sup>4)</sup>這樣的斷句方式，則表示此書在中國出版，或是為中國人準備的。

眾所週知，19世紀的中國人並沒有把日語看作一種外語，而是抱著“中日同文”的概念，認為日語是中國方言的一種。1887年赴日的中國第一代駐日使團，何如璋、張斯桂以及黃遵憲等人對日語的認識有了轉變，並開始有準確科學的記載，但中國社會並沒有對此形成共同的知識，所以在19世紀的中國日語既沒

2) 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3) 序言中有“剗劂既蕝并矣”字樣，因此推測此書為雕版刻書

4) 下劃綫由筆者所加

有作為商業語言來廣泛運用，也不被作為學術語言對待<sup>5)</sup>。

《東語簡要》編纂的時期，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還沒有出版。當時與日本貿易交流漸盛，序言中對於編纂目的的闡述也提到了貿易日漸繁榮，面向的學習者也是在中國國內需要使用日語的人。但其真正的動機卻是因為清末上海地區茶寮興盛，客人苦於無法交流，遂編纂此書，供他們消遣時使用。

“竊以中外通商，迄今已久，初時不過英、法美諸國而已，繼以泰西各國來者益眾，輯睦愈敦。仰見我朝深仁厚澤，敷被遐荒，視中外如一體，足使海國臣民廣開見聞。近則東瀛步武泰西，亦於通商各埠駐設領事，而上海首屈一指。且日人於租界建房屋、創市肆，鱗次櫛比，即茶寮之增艷鬥麗，亦可謂酒天花國中，別樹一幟矣。惟我之人欲啜茗消愁者，苦於語言不通，徒乎負負，亦豈非一憾事乎。余友玉燕居士，久歷東瀛，於該國語言文字，靡不精通。茲因公冗來滬，感時事之日新，嗤斯人之舌歧，爰將日本要語摘錄一編，付諸梨棗，以公同好。俾使中東人民和好益敦，懋遷益盛。”<sup>6)</sup>

## 2.2 內容

此書每頁10個詞，豎排，上為中文，下為中文漢字標注的日語讀音。以中文檢索（即將中文翻譯為日語）的形式來收錄簡單單詞、短句。收錄詞條1017個，按照事物分為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人倫門、帳房門、屋宇門、數目門、禽獸門、魚蝦門、顏色門、服飾門、人身門、花果門、器皿門、食物門、五金門、筵席門、船車門等18類。本書將不便分類的詞彙和簡單會話，按照長短分成一字門、二字門、三字門和成句門4類。其中三字門中已經有短句出現，而成句門基本為簡單的會話用句子。

儘管作者有旅日經驗，但是本書中並沒有使用假名來標注讀音，而是全部使用中文漢字。當時還沒有拼音文字，所以用切音標示。如胡琴（可幾）、百（下戈）和客人（亞卻阿枯）等等。這說明作者在日所受的日語教育應該是以口語為主，不是系統正規的外語教育，至少使用假名甚至漢字的機會應該不多，也有可能是由於作者在日時間並不長。

此書的內容與翁廣平編著的《吾妻鏡補》相似，甚至福島邦道說此書是“對《吾妻鏡補》的剽竊”<sup>7)</sup>。雖然《吾妻鏡補》也只使用中文漢字標音，但在書中提到了“日語夷譯語四十八字”，附上了“伊呂波歌”。可見在編纂《東語簡要》的時候，作者並沒有一個能夠讓他寫入日本文字的日語認識。

與《吾妻鏡補》相同的部份，標音也是一致的。其中有部份簡化，如“地”在《吾妻鏡補》中標為“治”和“雪搭”，在《東語簡要》中則只有“雪搭”這一個讀音。還有一部分是因為說法不同造成標音不同，如《吾妻鏡補》中“甚麼東西”標為“可力那宜”（これなに），而《東語簡要》則變成了“那宜木奴”（なにもの）。可見後者均為參考前者的讀音。

所標注的中文漢字讀音，可以推測為上海一帶的方言。根據序言所示，當時江浙滬已經有許多日本人在經商往來，而茶寮也在上海地區興盛，因此此書不僅受眾相對固定，也有一定的地域限制。

5) 沈國威（2010）《日語難嗎？——以近代初識日語的中國人為說》陝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3輯

6) 玉燕（1884）《東語簡要》之茂苑浣花生序 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筆者斷句，下同

7) 福島邦道（1993）《日本語館訳語攷》笠間書院

《東語簡要》中加入了許多《吾妻鏡補》中沒有的新詞，也有一些詞未收錄其中。李小蘭在其碩士論文《清末日語教材之研究》中將加入的新詞進行列表說明，參考這個表格，筆者整理兩者差異如表1<sup>8)</sup>：

表1

《吾妻鏡補》	《東語簡要》	《吾妻鏡補》中沒有的詞	《東語簡要》中沒有的詞
天文時令類	天文門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日、今日好、今日不好、昨夜、早起、朝、晝、日中、天晚、今晚
	時令門	日間、夜間、上午、下午、禮拜日、一個月、兩個月	
身體類	人身門	口、指、陽具、陰物	癩痢頭、麻臉、會面、身體、搓手、拍手、拓手、爪、背、擦、用心、飛信、小心、無心人、沒良心、膽大、膽小、伸腰、卵、卵袋、口、尿、小尿、大腿、膝、小腿、伸腳、氣、動氣、力大、出力、費力、淚、涕、口唾、痰、屁、汗、形、影、醜貌、標緻、清秀、齊整、風流、醜陋、老、後生、性命
人物類	人倫門	中國人、東洋人、外國人、鄉下人、老叟、老婦、東家、朋友、口店、馬夫、侍者、巡捕、童孩、麻子、相與、房東、租戶、匠人、裁縫、小工	君子、小人、善人、惡人、馱子、無情人、浮頭、伶俐、誠實、乾兒、媒人、幫閒、小廝、使女、戲小旦、皇帝、做官的、讀書人、道士、烏龜、婊子、好婊子、婊子使、刻薄、忠直、忠厚、正經、大量、家主、堂客、長輩、平輩、令尊、乾娘、夫、新郎、新娘、大頭目、小頭目、年行司、高木公、街官、街財副、通事、夫頭、守番、搜子、唐人、財副、總管、夥長、舵工、管公廝、總捕、小工廝、尊駕
禽獸蟲魚類	禽獸門	蝴蝶、蟬	象牙、牛角、犀角、皮
	魚蝦門		
花木類	花果門		蕊、心、山丹、棣棠、百合、瑞香、錦葵、六月雪、剪春羅、剪秋羅、秋海棠、竹口、
食物類	食物門	蛋餅、糖點、開水	粽子、糕、糕餅、饅頭、小菜、送菜、大茴、砂仁、藥、茯苓、石羔、雄黃、硃砂、味亞、澀
衣服類	服飾門	袴、拖鞋、緞、手帕、襪、眼鏡、小照、枕頭、手套、印花	包袱、素緞、大縐紗、中縐紗、小縐紗、紅縐紗、襖子
	顏色門	灰色、茶青	色、好花樣、大花、細花、鑲邊、口印、
房屋類	屋宇門	房子、房間、店鋪、茶館、酒店、錢莊、書坊、戲館、妓院、鞋店、雜貨店、洋貨店、綢緞店	紙窗、唐人公館、公堂上去、街官房、街官房去、轎房
船中器用類	船車門	火輪船、中國船、洋槍、駁、馬車、東洋車	餘利、大秤、小秤、尺長、對賬、合賬、奏本紙、做詩、煙筒袋、煙包、點火、烘火、火罩、火箸、剔牙籤、唐扇、荷包、鈕扣、針、大桶、小桶、方盤、剪燭煤、燭筓、手照、燈、香、芸香、夙香、丁香、麝香、安息香、著象棋、貨、起貨、秤貨、裝貨、細貨、粗貨、包頭、裝包頭、漆、水銀、冰片、綠礬、明礬、黃蠟、磁器

8) 有部份詞語並不在兩本書的相似分類中，如《吾妻鏡補》中“船中器用類”收錄了許多器皿，服飾等類的詞語，在表格中就不再分類。許多詞語中文表述略有差異，但是從讀音上看應該是同一個詞語，故算作相同詞彙也不收錄在表格中。《東語簡要》二字門、三字門及成句門中多為短句，因此不放在表格中，同理《吾妻鏡補》的人事類、俗語類和州名島名類也不包括在內。《東語簡要》一字門與《吾妻鏡補》的通用類雖然有許多相同之處，但通用類也包括許多二字詞語，因此也不在表格內列出。

數目類	數目門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一錢、一兩、十兩、千兩、萬兩
《吾妻鏡補》 中沒有的分 類	帳房門	算帳、收銀、利息、用錢、定銀、收條、憑據、找頭	
	器皿門	洋燈、屏風、面盆、剪刀、轎子、木器、竹器、古玩	
	筵席門	茶杯、盆子、牙籤、豁拳、洗面、吃茶、吃酒、吃飯、茶口、瓷器、自來火、肥皂、火油	
	五金門	洋錢、一角、二角、一元、二元、五錢	

從上表可以看出，《東語簡要》大量借鑒了《吾妻鏡補》的詞語，但分類比後者稍細，而且在詞彙的篩選上，對後者中不再常用的詞彙都不作收錄，而是補充進當時所用的新詞彙。但是，同樣也可以看出，《東語簡要》增加的詞彙中並沒有太多貿易類詞語，包括後面的短句在內，收錄的內容多以茶寮中的交流為目的。

此書的分類和編寫方法，都承襲了以往舊式的記錄形式。但作為一個有赴日經歷的人，作者對日語“靡不精通”，因此與以往毫無日語基礎的作者相比有了很大的優勢和進步性。最大的表現為書中收錄了實用會話短句。其中“三字門”101句，“成句門”49句，共計150句。從這一點來看，此書已經開始注重實用性，以與日本人的交流為目的，不再單純將日語當作方言記錄下來。

但無論如何，此書充其量是一本在一定地域發行，面向特殊人群的“單詞書”。從詞句的收錄來看都帶有一定的針對性，或許我們認為這是中國人編纂的第一本日語教科書並不準確，作為“第一本有教授日語意圖的書”應該會更為客觀。

### 3. 東語入門

#### 3.1 版本及序言

本書現在可看到的原刻本為東京都立日比穀圖書館藏的實藤文庫本，複刻本也被收錄於《纂輯日本譯語》，分為上下兩卷。20×12.2cm，石印本。同文庫中此書有兩卷一冊本和兩卷兩冊本兩個版本，文字的編排方式和張數均不相同，但是內容完全一樣。兩冊本中，有兩處排版印刷錯誤。根據書中內容，目錄中的“服飾門”應在“宮室門”之後，另外一處為下卷第33頁左側的內容與第32頁右側完全相同。一冊本中則沒有這樣的錯誤。本文參考的為兩卷一冊的版本。

扉頁寫有“光緒乙未年（1895）”字樣，序言也寫於同一年（光緒二十一年），因此推測本書的刊行年份為1895年。同文館在1897年建立日語學科，到1900年的三年之間，清人編纂的日語教科書只有這一本《東語入門》。

本書作者為陳天麟，字念祖，海鹽，即今浙江錢塘人<sup>9)</sup>。關於他的生平不詳，但是從王韜為其作序這一點上來看，他應該在知識份子中有一定的地位。陳天麟的父親是陳明遠。根據《遊歷日本圖經》第十八，中國使臣表所示，陳明遠作為第三代駐日公使徐承租和第四代駐日公使黎庶昌的參贊官赴日。每任公使的任期為三年，因此他應該在日本六年。

本書序言分為王韜序和作者自序兩部份。兩份都寫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閏月。王韜為陳明遠的友人，因此在序中對陳天麟做了簡單的介紹，指明其隨父赴任，一起前往日本，在日六年，掌握了一定的日語。陳天麟在自序中也對此進行了說明。

“念祖茂才、我友喆甫觀察長嗣也……前者觀察參贊日東、念祖航海隨任、趨庭授學之暇、兼通東西語言文字”<sup>10)</sup>

“在東京六年、該國語言文字畧能會通一二”<sup>11)</sup>

同時在兩篇序言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人日語學習的情況，與西洋語言仍無法相比，而教科書的數量也有很大的差距。兩篇序言中都提到當時與日本的貿易交流越來越興盛，因此語言能力的不足逐漸顯露出來，日語學習無從下手，這成為本書的編纂動機。

“念祖乃出其所知、成東語入門一書、為問道之津梁、舌人之木鐸、俾貿易場中通問答者作先路之導焉……效英法方言著書者獨夥、而於東語缺如、使學者無從入門、未免遺憾”<sup>12)</sup>

“我華人之攻讀英法諸文者日甚一日、惟研究東學者寥寥、蓋亦苦於未得其門耳……兩國近又修睦、增開商市、東人之來我華者愈多、貿易日盛、易啟猜嫌”<sup>13)</sup>

但是1895年正值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赴日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4月17日締結條約，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據序言，同年7月出版了這本《東語入門》。雖然本書在社會上的影響無法考察，但其中期待通過學習外國事物使中國強盛的願望，在序言中還是可以看到的。只是這樣的考慮，不知是王韜自己的意識，還是陳天麟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了王韜。但是終歸本書還是從貿易的角度出發，學習外國事物也是為了在生意場上知己知彼，並不一定是學習外國的體制、知識等。

“明洋務諳外情、本末兼賅、中西畢貫……於國家得著富強之實效、此其亟也”<sup>14)</sup>

9) 陳天麟編譯(1895)《東語入門》自序“海鹽陳天麟自識”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10) 同注7之王序 筆者斷句，下同

11) 同注7之自序

12) 同注7之王序

13) 同注7之自序

14) 同注7之王序

當然，當時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運動也以失敗告終，因此其“中體西用”論的局限性也逐漸顯露，人們開始將目光移向日本。此書是甲午戰爭失敗後可查的第一本中國人編纂的日語教科書。陳天麟自序中提及的“兩國近又修睦”，推測是指新簽訂的條約，在戰敗的背景下提及兩國友好，或許有部份難言之隱。作為當時唯一可供選擇的日語教材<sup>15)</sup>，王韜的序言似乎也預示著單純的日語教育開始背負起通過向日本學習而強國的願望。

從王韜序言中對於日語“方言”以及“區區之東語”<sup>16)</sup>的說法上來看，也可以推測其對日語並不是很重視。當時對日語的認識仍然殘留著“中日同文”的觀念，即日本與中國使用同樣的文字，是中國方言的一種，儘管此書編纂時間距離《東語簡要》已有11年，這樣的看法仍是當時社會對日語的主流認識。因此這並不能說是王韜的偏見<sup>17)</sup>。但是陳天麟在日六年，對於日語有著自己的認識，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兩種語言的異同，這可以說是這本教科書的進步所在。

陳天麟在自序中提及假名的存在，表明其有四十八個字母。也提到日語為表音文字，與西文類似。另一方面，則指明漢字是表意文字，每個字都有自己的意義。認為中文和日語使用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儘管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對於日本文字已經有了相關的記載，但推測陳天麟在編纂此書的時候並沒有參考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例如黃指出日本“土音只有四十七音”<sup>18)</sup>，陳所說的四十八個字母與之不符。

「日本字與語同、四十八字母、一字一音、聚音成言、就言見義、或兩三字成一言、或五六字成一義、間有七八字至十數字者、頗似西文拼字之法、以視我國之每字各具其義者、判然不同矣」<sup>19)</sup>

### 3.2內容

在清末的日語教材中，《東語入門》是第一本有日本文字，即假名教學的教科書。其中除了“伊呂波歌”之外，還有五十音圖。雖明確日語文字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sup>20)</sup>，但將平假名稱為“大寫”，片假名稱為“小寫”，以及作者掌握西文的前提<sup>21)</sup>，這樣的說法應該是受到了英語的影響，凡例中也說“東字拼法頗與西文相同”，雖然作者意識到與漢語表意文字不同，日語假名為表音文字，但是認為其與西文相同仍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也可以說明作者在日期間接受的日語教育並不是日本方面的教育，沒有進入正式學校由老師教授讀音。而沒有採用羅馬字注音，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國內關於羅馬字的知識尚未普及開來。

不僅是清音，本書對濁音、半濁音、長音和拗音都有收錄，但作者並沒有明確分類，只說明東語千變

15) 實藤惠秀(1942)《中國人の日本與研究》國語文化講座6《國語進出篇》朝日新聞社P274

16) 同注7之王序

17) 精通西文的王韜在序中對於英法亦稱“方言”

18) 黃遵憲(1887)《日本國志》卷三十三 學術志二P1417 載於(2005)《黃遵憲全集下》中華書局

19) 同注7之自序

20) 書中稱其為“偏假名”，這一點黃遵憲在《日本國志》提到“片之言偏也”，但名稱上還是使用片假名，因此也可佐證《東語入門》並未參考《日本國志》

21) 王韜在序言中提到陳天麟“兼通東西語言文字”，因此推測陳有西文基礎

萬化“不外此四十八字”。假名均用漢字以切音方式標示讀音。關於本書的注音，作者在“凡例”中有很詳細的說明。

“書中所載拼法傍注華音”

“所注音係就江浙口音、易於通用、而東國之音、中國無字相肖者甚多、書中俱以反切取音、凡旁加一柱者均須反一音而讀之”<sup>22)</sup>

本書仍是江浙口音注音，但是作者也強調說“不以土語夾雜其中”，可以推測是使用當時南方的官話作為注音標準。從注音上來看本書比《東語簡要》更接近現代標準日語的發音，且將切音加上下劃綫，比起前者來這樣的標注方式讓學習者能夠一目了然。

本書分上下兩卷，按照中國類書的方式進行分類<sup>23)</sup>，共分35類。上卷中包括天文門、時令門、地理門、郡國門、君臣門、刑法門、人倫門、人物門、形體門、文事門、武備門、珍寶門、服飾門、宮室門和飲食門15類，下卷為舟車門、器用門、醫道門、采色門、數目門、秤尺門、果蔬門、草木門、花卉門、飛禽門、走獸門、鱗介門、昆蟲門、進口貨門、出口貨門、一字語門、二字語門、三字語門、四字語門和談論門20類。全書共收錄詞彙1921個<sup>24)</sup>，三字語門、四字語門和談論門為短句和簡單的會話用語，其中談論門收錄了69條會話。這樣的編纂方式，在《華英通語》(1855)和《新增華英通語》(1893)中也可以看到<sup>25)</sup>。

上為中文，下為日語片假名讀音，旁注漢字讀音和標有下劃綫的反切音。如“雨天(ウテン 烏聽)、龍眼(リュウガン 利烏 額痕)和多謝(アリガトウ 阿利額託)等等。與《東語簡要》不同，本書採用的是日語檢索的方式，即以中文翻譯日語詞彙<sup>26)</sup>。凡例中作者也指出“所譯華文亦不以土音夾雜其中”，這也證明了作者在學習過日語後，將中文翻譯放置在上作為詞條。因此作者的出發點為日語，這樣易受到日語的影響，其中就出現了许多漢語不再使用的詞。如天文門中的“天河”一詞。當時漢語已經使用“銀河”這樣的說法，但是先入為主的日語詞彙使得作者直接作為中文詞彙將其放在上面了。

這說明作者並沒有意識到日語分為以假名為主的口語和漢字為主要的文章語。但是黃遵憲在《日本國志》已經提到，日語“用假名不得不雜漢文”，其中漢文用於讀書，“專以假名以成文者，今井細民、閭巷婦女通用之文也”<sup>27)</sup>。陳天麟並沒有黃遵憲這樣的語言學意識，除了個人素養之外，應該是由於所受教育的影響。1882年第二代駐日公使黎庶昌在公使館內開設了東文學堂，為使館培養翻譯人員。陳並不是清朝派遣的學生，而是作為家屬，應該是在類似於私塾的地方學習日語。為了能更快地適應環境，筆者推測是由口語開始進行教育的，因此作者可能並沒有許多機會接觸或使用漢字。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應該不會

22) 同注7之凡例

23) 同注7之凡例“書中所分各類名目悉照中國類書之例”

24) 兩册版本中有20個詞彙是重複的，應是印刷錯誤

25) 內田慶市(2009) <ピジン——異言語文化接觸における一つの現象> 《言語接觸とピジン》 pp 1-13 東京 白帝社

26) 劉建雲《中國人的日本語學習史——清末の東文學堂》(2005)中提到此書與明代《日本館譯語》類似，“日常に使う中国語を想定して対応する日本語を当てるといふ体裁をとっている”，似乎并不準確。P224

27) 同注15之P1418



有正式的教材，大抵使用的是日本的小學教科書，如《童蒙教草》這類漢字較少的讀本、教材。那麼在日六年的作者對於日本文字並沒有形成正確的意識也就不足為奇了。

書後收錄的短句和會話文，出現了簡單的問答，其準確性和完整性，已經超越以往任何一本日語書籍。會話中雖然並沒有“テニヲハ”，但在口語表達中並無障礙。如：

你能操華語否（アナタシナノコトバハナシマスカ）

我畧能幾句（ワタシスコシハナシマス）

此書注重實用性，分類細，範圍廣，收錄的詞彙和短句多為日常用詞，也包括許多新事物在其中。如“牙粉”、“楊梅素”等等。與《東語簡要》相同，本書也是以在國內的學習者為對象，以在國內與日人的交流為目標編纂的。不過書中沒有語法教學，對於日語的分析也並沒有從句子結構上著眼，更沒有明確日語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單詞與語句也並沒有分開，這使得本書也只局限於死記單詞和簡單會話便能立竿見影的詞彙會話集的水準。因此，本書也並不是中國人學習日語的理想教材<sup>28)</sup>。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在許多詞彙注音和句子中，已經開始有“テニヲハ”的出現，如“天象（テンニアラハレルモノ<sup>29)</sup>）”等等。儘管黃遵憲早就對虛字進行了分析說明，但在清末的日語教科書中，《東語入門》還是第一本出現的教材。

## 4. 東語正規

### 4.1 版本及序言

1882年第二代駐日公使黎庶昌在公使館內開設了東文學堂，但由於甲午戰爭的緣故，在1895年關閉。館內的東文學堂專門培養日本通商入口的翻譯人員，從國內選拔學生赴日，由日本教師授課，學成後作為東文翻譯為使館效力。13年間東文學堂共培養了12名畢業生。1896年，清政府派遣了13名中國青年赴日。儘管康有為最早提出翻譯日本書籍向日本學習的觀點<sup>30)</sup>，但真正引發派遣留學生和翻譯日書熱潮的是1898年張之洞的《勸學篇》。因此1896年派遣這13名青年的目的應該是與最初一樣，即為公使館培養翻譯人員。但當時公使館已無法承擔日語教育，故第七代駐日公使裕庚通過當時兼任外務大臣的西園寺公望，將這些學生委託給了東京高等示範學校的校長嘉納治五郎。這樣這13名學生就進入了日本的教育系統，共畢業7名。本書的作者唐寶鐸和戢翼翬就在其中，因此他們在日本普通學校中學習的內容在此書中也有所反映。

唐寶鐸（1878—1953）生於上海，字秀峰。1896赴日人員中最年少者。在嘉納治五郎門下，就讀於亦樂書院。1899年畢業後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日本長崎領事館代理副領事。1901年調任駐東京公使館館員。在公使館擔任翻譯期間，還兼任宏文書院（即原亦樂書院）講師。1903年轉入東京專門學校學習，畢業後轉入由該校升格而成的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於1905年（明治38年）畢業，是中國第一批在日本取得學

28) 劉建雲（2005）《中国人的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學術出版会P32

29) 筆者加下劃綫

30) 沈國威（2010）《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享》中華書局P248

士學位的學生之一。畢業後回國，清光緒三十二年—宣統三年（1906至1911）間，歷任北洋司法官養成學校監督（校長）、洋務局會辦、陸軍部一等首席參事官、川粵鐵路督辦等職。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南北和議中，唐曾任北方總代表唐紹儀的參贊。民國肇建後，歷任北方政府國會眾議員、大總統顧問、直隸都督府顧問、外交科長、綏遠將軍署高等顧問、榮旗墾務督辦署秘書長、歸綏警務處處長等職。1924年11月退出政界後，之後在北京、天津兩地開辦律師事務所，並在天津定居專執律師職業。1953年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有《東語正規》、《日本明治維新概要》等多種著作留世。

另一位作者是戢翼翬（1878—1908），湖北房縣人，字元丞。1896年官費選送日本，在嘉納治五郎門下學習三年後，轉入東京專門學校學習，同時就讀於亦樂書院。在日求學期間，創設專門翻譯和出版日本書籍的譯書彙編社（東京）與出洋學生編輯所（上海），又與實踐女子學校校長下田歌子創辦作新社，大量翻譯及出版日文書籍。並設立圖書居，印刷局，後加入興中會。主持創辦《譯書彙編》、《國民報》、《大陸》月刊，揭露清政府黑暗腐朽，為民主共和吶喊。1905年任外務部主事，借機改革法律、薦用黨人。後被袁世凱入奏“交通革命黨，危害朝廷”罪，革職押解回籍，1908年逝於武昌。

本書正是由作新社出版，版權頁印有“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三日印刷、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五日發行”的字樣，因此本書的初版為1900年。筆者引用的是實藤文庫本，1906年第10版<sup>31)</sup>。11.5×17.6cm，全書三卷，成一冊，250頁，活版印刷。

本書序言為作者自序，開篇寫有“歲辛醜之冬、期滿將歸”，根據兩位作者的生平介紹，唐寶鐸正在東京公使館工作，因此這篇序言應為戢翼翬所做。初版“在中國發印、殊未便、故不能不在東付印”，但是隨著國內“譯述之書、多至十餘種、已成策”，有了良好的學習環境，此書後來也在中國付印。與《東語入門》相同，本書也是為初學者所做，因此作者“措詞祇取簡潔”<sup>32)</sup>。

甲午戰爭的失利，使洋務派主張的“西學東漸”的觀點暴露出局限性和不適應性，自1897年梁啟超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譯日文書的方式引進西方新知識起<sup>33)</sup>，變法的學習目標開始轉向日本，特別是這些在日本生活學習的學生們，更能體會其中的重要性。日語成為瞭解外國事物的途徑，中國人學習日語也有了新的動機。因此戢翼翬在序言中言明：

“思謀輸入東邦文明、以享吾同胞之有志新學者”

“竊思我國當茲創鉅痛深之後、有志之士旋思磨蕩腦力、以為變法用”

而這一點更多地體現在再版中。初版書中收錄有“古文聊齋數則”，再版則“增入散語數則”，凡例中也說“將原刻古文及聊齋誌異刪去、增補散語甚多”。作者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有意將此書作為赴日的中國人的教材，更期待通過掌握語言，引進日本的新知識。因為“言語為人類交通一大關鍵”<sup>34)</sup>，而“將來東渡留學者、更當不絕於道、則輸入文明之先導、不得不求之於語學也”。作者也希望“研究此書即可

31) 版權頁印有“光緒三十二年一月廿五日十版發行”

32) 唐寶鐸、戢翼翬（1895）《東語正規》之凡例 實藤文庫

33) 沈國威（2010）《日語難嗎？——以近代初識日語的中國人為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3輯

34) 同注31

從事一切普通專門學問”<sup>35)</sup>，以此提高民眾整體素質，接受新知識。

《東語正規》是清末中國人編纂的第一本系統介紹日語語法的教材。儘管仍有許多概念表述並不準確，但是作者對日語的把握比玉燕和陳天麟要更為科學全面。作者已經意識到口語與文章用語的區別，以及日本文字的“漢字”、“字母”之分。

“日本只有文法、決鮮語法等書初學者苦無考證、茲特刻意搜求編成語法一篇、旁及文法”

“中東文法各殊”

“是書所有應用漢字處則用漢字、應寫字母處則仍寫字母”<sup>36)</sup>

## 4.2 內容

### 4.2.1 文字

本書共分三卷，卷一為語法，分為文字溯源、文字區別、字母原委、字母音圖、字母解釋、聲調、拼音法、變音、文法摘要、虛字、言彙、學期和學訣14個部分。主要從語言學角度對日語的基礎介紹，涵蓋了文字、語音、詞彙和語法四部份內容。

在文字部份作者對日本文字的歷史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明確了日語的訓、音之分，音又分吳音和漢音兩種。不過作者稱“漢音唐代之音也、吳音吳越之音也”，一個以地點為準一個以時代為準，這樣的解釋並不科學。

日文字分為訓、字音、和字、國訓和新字五種。“訓”為假名，“字音”為漢字。“和字”為日本自創漢字，“國訓”是指使用漢字，音為訓，但意思不同。“新字”則是為適應外來語而使用的漢字，以合體字為主，這也是明治時期日本特有的文字現象。

在作者的表述中，明確指出漢字，為文語用字，以前“閩照之民、視為畏途、習之者寡”。也提到假名是用來拼讀漢字的。“訓與字音編文，曰假名混文”，即“假名交じり”，另外一種則是“意義深奧者曰和文”，指當時的祭祀用文。儘管黃遵憲早已意識到日語的書面語和口語問題，也說日語有“漢字雜假名以成文者，有專用假名以成文者”，但是清末的教科書提到這兩點的，本書還是第一本。

作者介紹了平假名、片假名，並對其來歷做了說明，將源頭中文漢字稱為“真體”，這應該是出於一種文化自豪感。作者在後面提到，“五十音雖無意義”，這說明作者也意識到日語假名為表音文字。後附有平、片假名的五十音圖和濁音、半濁音、撥音、促音、合字、變音要字表，平假名變體字母表，以及漢字平假名草體和普通的“伊呂波歌”。這些變體或者漢字草體的文字在日語教材中也是第一次被引入。但這不同於字體，並不是同一文字的不同寫法，而是不同的文字表示方法。將這樣的內容編入面向中國人的日語教材，一方面說明，此書希望學習者能夠全面詳細地掌握日語知識，另一方面也證明，這部份內容是明治時期重要的語言知識。

假名表中，作者在後面分別標注了對應的真體，以及漢字讀音和羅馬字讀音。漢字標音為切音，分官音、吳音和粵音三種。本書也是第一本使用羅馬字進行標音的教材，第一次將這種科學的音聲教學引入到

35) 同注31

36) 同注31

教科書中。從另一方面看，當時中國社會對於日語知識的積累並不多，相反英語知識則相對普及，使用羅馬字則可以更易於接受理解。本書對於文字的介紹非常全面，例如撥音作者說明其“用於漢音”，甚至對促音的發音方式也進行了簡單的說明。

#### 4.2.2 語音

作者認為日語音韻與中國漢字大略相同，“韻為母音、音為子音”。母音為“アイウエオ”五音。“其與母音，並而成子音之音者、謂之父音”<sup>37)</sup>。同一時期，落合直文和小中村義象在1893年出版的《中等教育日本文典》中則有“父音”的概念，其中內容與本書幾乎相同。

“母音を配合して、子音を生ずる、九個の聲音あり、これを父音といふ。(中略)片仮名をもて、これを書きあらはす時は、クスツヌフムユルウ九個の音の幽微なるものなり。この音、母音に配合して、子音を生ずるものなれば、一にこれを原音ともいふ。”<sup>38)</sup>

但是，大槻文彦在1891年出版的《語法指南》只有“半母音”的概念，沒有“父音”的相關內容。可見作者當時所受的日語語音教育，應該是包含“父音”概念的。

作者將濁音半濁音、撥音和促音在內的日語發音，分為喉音、齒音、舌音、唇音、撥音（鼻音）、促音、鼻音，共八十二字，“此日本從來之本音也”。後面有拗音表、長音表和拗長音表，對於“拗音”這個名稱也是第一次在教材中引入，其中也介紹了半母音。但作者顯然對語音的研究並不透徹，例如鼻濁音“ガ”行假名，並不能歸為“日本從來之本音”。

本書也是清末中國人編纂的第一本寫有日語音調的教科書。除了語氣之外作者認為日語也分“平上去入”四聲。當然從現代語言學角度來看，日語音調只有高低之分，但當時日本人本身可能也並未將自己語言的音調問題搞清楚，故作者以中文四聲來解釋也並不意外。

作者專門開闢一個分類為“變音”，分為長變音、短變音、跳變音、雜變音和省變音五種。這一部份包括了語音和語法的內容。其中內容涉及了漢語鼻音變化而來的ン變為日語的イ或ウ、形容詞終止語キシ變為イ、形容詞連用ク改為ウ、動詞的イ音便、促音便和撥音便、（為強調或節奏）拉長讀音添加イ、ウ、撥音和促音、ハ行讀ワ行五音、复合名詞拼音讀法、連濁、形容詞後接カッタ以及母音脫落等各種現象。因此這一部份的內容如果作為語音變化規則的說明，其中卻沒有進行語音方面的專門解釋；而作為語法的介紹，又沒有像後面語法相關內容中那樣按照語法教學的方式進行說明，更有許多概念作者本身也沒有解釋清楚。因此作者編纂此部份的意圖不明，看起來也十分混亂。

雖然本書對語法有系統的介紹，但是作者將許多現象歸類於假名和語音的變化，並收錄在假名或語音的內容當中，這應該是作者的理解有誤以及編排的問題。例如在介紹撥音和促音時，將動詞接テの連體形的撥音便和促音便收錄在內，但作者是當做語法進行解釋的，因此應該是編排問題。而將許多語法現象歸類於變音則是作者理解有誤了。

37) 指ウ段假名，從說明上看應該是指有半母音作用的ウ段假名

38) 落合直文、小中村義象（1893）《中等教育日本文典》P4 東京博文館

#### 4.2.3 語法

本書出版的時間，正值中文語法系統還未建立，日語語法系統尚未完善的階段。因此，當時語法方面可利用的資源較少，而日語語言學的學者們也是處在摸索階段。第一本漢譯語法文典在1903年才出版，因此當時也沒有為外國人準備的語法書。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中國學習者介紹日語的語法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例如許多術語在中文中找不到對應的詞彙，許多語法現象因為中文語法學知識的不足，也不能找到相對應的釋義。而作者的語言學知識也相對有限，例如儘管對詞性有較為詳細的介紹，但卻沒有從句子結構進行分析。這使得本書的語法教學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認為語言的成份不同，每個成份有自己的專門術語作為名稱。這些成份就是組成語法的部份，而各個國家各種語言都有語法且各不相同，但這些名稱應該是一樣的。從這一點來看，作者對於從日語引入日語品詞名稱的術語並不排斥，這樣的觀念在中文語法系統未完善的環境下，應該是具有一定先進性的。

“言語之中、有卻別、然後有名稱、然後又文法、名稱者文法之始也、環珠有文字之邦、皆有文法、雖各國互異、至於言語之稱謂則一。”<sup>39)</sup>

因此在本書中，語法的第一個部份就是品詞分類的相關內容。共分八類，為名詞、代名詞、動詞（附助動詞）、形容詞、副詞、後詞、接續詞、感歎詞。

名詞分為普通名詞和特別名詞。普通名詞中又分有形名詞和無形名詞，從釋義上看，分別相當於現在的具體名詞和抽象名詞。而特別名詞，即人名、地名和國名類名詞，這種分類應該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中文和日語不同於西方語言的書寫方式，無需特殊形態來進行意義上的區別，因此中文和日語並不需要這樣的分類。如1897年國內出版的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中，並沒有這樣的分類。不過日本的語法受到西方教育的影響，在當時已經引入了這個概念。如上文提到的落合直文和小中村義象在1893年出版的《中等教育日本文典》中，是按照這樣的分類方式對名詞進行分類的。

本書在普通名詞中還分出拔萃名詞一類，其中包括動詞拔萃名詞和形容詞拔萃名詞。從內容上看，是指動詞和形容詞的詞形變化，以及動詞加形式體言“こと”。不過，在上述的《中等教育日本文典》中，作者也提及省略詞尾的動詞會變成體言<sup>40)</sup>，而《馬氏文通》中在名詞中關於“通名假借”一類中也有假借靜字、動字和狀字的分類<sup>41)</sup>，但顯然本書的作者並沒有分清楚名詞和名詞性成份。而編纂教科書應該將品詞名稱與品詞的語法作用分開，從本書多處內容來看，作者並沒有這樣的意識。

代名詞分為普通代名詞、人代名詞、問代名詞和指示代名詞。包括事物、地方、方位的“こそあ”系列、人稱代詞，第一、二、三人稱、疑問代詞和連體詞“この・その・あの・どの”。與現代不同，どれ、どこ、どちら都算作問代名詞類。作者提到近稱、中稱和遠稱的名稱，但並沒有提及“不定稱”。《中等教育日本文典》中並沒有這樣的分類，甚至連“第一人稱”、“第二人稱”這樣的名稱都沒有提及，但《語法指南》中的內容已經與現代語法無異。

39) 唐寶鏗、戢翼舉（1895）《東語正規》實藤文庫 P24

40) 落合直文、小中村義象（1893）《中等教育日本文典》P44東京博文館

41) 馬建忠（1893）《漢語語法叢書——馬氏文通》P34商務印書館

動詞部份作者首先分為自他動詞兩類，後按照詞尾變化分為正體動詞和變體動詞。前者包括四段活用、上二段活用、下二段活用和下一段活用；後者則包括カ行變格（来る）、サ行變格（する）、ナ行變格（死ぬ）、ラ行變格（ある）在對他動詞的描述中，作者提到：

“動作及他物之詞、如白虹貫日、貫者、非日自貫、白虹貫之也、大雨漲河、漲者、大雨漲之也之類”<sup>42)</sup>

動作涉及其他，有支配項，有賓語，這些是他動詞應該具備的三點要素，但是作者都沒有提到。當時《馬氏文通》中雖然沒有“賓語”這個名稱，但是已經有關於賓語語法功能的描述。而兩個例詞“白虹貫日”和“大雨漲河”也均不是他動詞的正確例子。其中“貫”表達的是場所，而“漲”表示的是原因。這樣不正確的理解，證明當時日語中也沒有一個完善的語法體系。不過《語法指南》中已經指出：

“動作ノ、他ノ事物ヲ処分スル意味アルモノヲ、他動詞トス”<sup>43)</sup>

★舉例也是如“蜂ハ蜜ヲ釀す”這樣正確的例子。造成《東語正規》作者理解不正確的原因，推測是由於當時中文和日語的語言學研究還未完善，作者沒有辦法獲得正確的相關知識。例如《中等教育日本文典》中對於自他動詞的分類也並不準確，分類為動詞的“自他格”，其中還包括了動詞的可能態。儘管沒有涉及“他動詞”這個名稱，但是對於他動詞的說明，還是提到了“他に然せさする詞”<sup>44)</sup>這樣的概念。

同時對於動詞詞尾變化，作者只提到“動詞因其事物動作之時、而變動其語尾”，對詞尾變化的原因也並沒有解釋清楚。以《語法指南》為例，其中對他動詞的說明如下：

“動詞ハ、其動作ノ意ヲ、数様ニ現ハサムトシ、又ハ、他ノ語ニ連続セムトスルが為ニ、其語ノ末ヲ変フ”<sup>45)</sup>

本書中提及“一語分將然、連用、忠直、續體、已然、命令等六種詞”<sup>46)</sup>。1900年前後終止形和連體形於現代不同，分別作為不同的形態，不過，從《語法指南》中分為直說法、接續法等類來看，當時日語中對於動詞形態的分類應該也並不統一。此書中提到動詞詞尾變化“文有八種、話有五種”<sup>47)</sup>，作者已經意識到區分口語和書面語的語法教育，應該是在日本接受日語教育的時候，已經開始出現口語文法教育，像上文提到的《語法指南》中也有同樣的分類。後面對動詞各形態的例句也都有“文”、“話”兩種分別列出。不過其中部份地方作者對動詞的分類也有謬誤之處，例如將“恨（ウラム）”放在上二段活用的分類

42) 唐寶鏗、戢翼翠（1895）《東語正規》實藤文庫 P28

43) 大概文彦（1891）《語法指南》收錄於北原保雄、古田東朔編《日本文法研究書大成》勉誠社 P17

44) 落合直文、小中村義象（1893）《中等教育日本文典》P82東京博文館

45) 同注42 P18

46) 同注41

47) 同上

中等等。

附助動詞一節主要介紹能動、被動和使役的相關內容，均分別注明文、話，對於附助動詞的定義也較為準確，其中關於敬語的介紹也比較詳細。筆者將此部份內容歸納如下：

- 被性之助動詞：動詞被動態（ル、ラル）
- 能性之助動詞：動詞可能態（ル、ラル）
- 使性之助動詞：動詞使役態（ス、サス、シム）
- 敬性之助動詞：敬語 オ+動詞連用形+ナサル（用於話），被性（用之者甚鮮），使性（文話適用），マス（自卑或尊人，用於話）
- 決定之助動詞：ナリ（用於文），デアル、ダ、デス、デゴザイマス、マス（用於話）
- 否定（不決）之助動詞：ズ、ヌ（音便ン）、ネ、ナク、ナイ、ナケレ
- 否定決定之助動詞：ナラズ、デナイ、デアリマセン、デゴザイマセン
- 未來之助動詞：見後“想像”

本書也是第一本引入日語時態的教材，作者將日語時態分為現在、過去、未來三種，後面加“想像”這一分類，不作為時態，實際上是動詞表示推量的未然形，筆者將其一併列在下面。

- 現在（動詞未經變化）
- 過去：タ、ツ、ヌ、キ、ケリ
- 未來：ム（音便ン、用於文）、ウ（用於話）、ヨウ
- 想像：未來之助動詞（動詞推量）ウ、ヨウ；決定之助動詞ダラウ、デセウ、デゴザリマセウ；否定之助動詞マイ、マシ（用於文）；上下一段活用；サ行變格（屬方言）<sup>48)</sup>

在日本當時的文典，例如大槻文彥的《語法指南》中，對助動詞的分類也有“使役ノ助動詞、受身ノ助動詞、敬語、推量ノ助動詞”等這樣的分類，對於時態也分為現在、第一過去、第二過去等等。可見作者的相關知識應該是來源於日本的文典。但是比起本書來，日語文典中的分類和描述更接近現代日語的語法，有可能是作者所在學校參考了其他的書籍或是教師在講解上有專門針對中國學生的教育方法。

本書關於形容詞的內容很少，只有百餘字。作者僅僅指出形容詞“用於名詞之前後”，按照詞尾變化分為“ク、シ、キ活用”和“シク、シキ活用兩種”，列出了詞尾各形態的變化，並將這兩個種類的常用詞也列在段末。例如“深長短善惡高低厚薄”等詞屬於前者，“悲宜久喜喧”等屬於後者。但是作者並沒有對形容詞進行更深入詳細的說明。從後面單詞部份作者對於形容詞類的收詞來看，作者似乎對於形容詞的品詞性也並沒有明確，相關內容在後文“單詞”部份有具體說明。

當時中文的語法中還沒有“副詞”這個稱謂，儘管《馬氏文通》中有關於副詞的相關內容，也指出其

48) 雖然作者明確寫出“屬方言”，但實際上為サ行變格接マイ的表現，例句中也只有“朝寝ヲセマイト思フ”這一句是方言。

有修飾性功能，但是並沒有使用這個術語來命名。上文提到的《中等教育日本文典》和《語法指南》中，都有關於副詞的內容，且也使用了這個名稱。兩者都對副詞的意義和用法進行了說明。前者更注重意義上的解說，包括副詞表示形狀、願望、推量、疑問、應答、反復、集合、強調和轉折等，並在用法上說明副詞可以接在形容詞、副詞、名詞和代名詞之上，或添加助詞後接名詞使用。後者則對於用法的說明則更為詳細，分別以名詞、形容詞和動詞作副詞的角度解釋副詞的用法。因此本書中使用的這個名稱應該是直接使用了日語的品詞名稱。本書關於副詞的內容也並不全面，作者僅介紹副詞是“用於動詞形容詞之上、以限制其語意之詞”，只說明了副詞的句法功能，但是對於副詞的用法和意義都沒有考察，且例句也並不多。作者將副詞分為三類，一是語尾不定之副詞，如“必ズ”，其次是帶虛字ニテ等字之副詞，它們的語尾不變，如“既ニ”。但是此類分類並不準確，有的ニテ是詞語的一部分，並不是虛字，如作者所舉的“決シテ”。最後是重疊名動詞之副詞如“年々”、“見ル見ル”，但動詞重疊的情況也並不能全算作副詞一類，這一點作者恐怕也並沒有搞清楚。

中文語法界直到1907年才由章士釗正式引入“副詞”這個術語。同樣是1900年出版的由梁啟超編纂的《和文漢讀法》中也提到了“副詞”這個名稱，可以說本書是較早的提及“副詞”這個術語的文本之一。

書中指出接續詞的作用為“接續詞句、或文章之詞……與漢文相同、亦帶虛字”。作者共舉了21個例句，在後面配有中文翻譯，無例句。作者說明瞭接續詞的意義和用法，並與中文意義進行對比，有的詞語還涉及文話的區別。從解釋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經意識到日語的漢字詞與中文意義的異同，不同場合中在意義上有所區別。這不同與以往的“同文觀”，是一種科學的日語認識。如對“抑モ”一詞的解釋：“此字與漢字之意大同小異、用於文字之間、作或解者、則與漢字同、用於文字之首、作語中一體（イッタイ）解者則與漢字異”<sup>49)</sup>。但是作者對於接續詞分類和用法的解釋並不多，多為簡單的中文翻譯，而上面提到的兩本日本文典中對於接續詞的介紹也不多，可以推測作者所接受的關於接續詞的教育也並不是很詳細。

後面作者共列出14個感歎詞，釋義涉及日語的位相，男性用和女性用以及是否有尊敬意等都有標注，後均附有例句。現將其整理如下表：

表2

例詞	意義	備註
エ	惊讶	应答尊上
ヤ	語末命令詞；語首感歎聲	
ヨ	呼人；軟語	軟語文中不用
ナ	追思，有恍惚之意；親密	表親密時比カ字稍有崇敬意
ナア	ナ引長	
カナ	叹息聲	
ガナ	懸想	古文及诗词用
ネ	亲愛之詞	文中不用。女子多用，用於語中間或尾處
サ	邀人；將做事，與起之音	文中不用

49) 同注41 P45



サア	サ引长	
イザ	同サ	文話通用
マア	暫擱前事；惊讶	文中不用
ハイ	应答	文中不用
ハア	笑聲；驚悟聲；男子應呼聲	文中不用

在本書的“接續詞”前有“後詞”字樣，下注“即天爾遠波虛字也，另詳載於下”。作者指出虛字“如漢文之焉哉乎也”，是文章的關鍵，如果不能掌握虛字，則無法正確使用日語表達。儘管黃遵憲在1887年就指出日語“語長而助詞多”、“實字在前虛字在後”<sup>50)</sup>，並對文中有虛字時的閱讀方法進行了說明，但在清人編纂的日語教科書中，本書是第一本肯定了虛字在日語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將其作為正式教學內容，進行系統介紹的教材。作者言明虛字的種類很多，其中テニヲハ為“虛字主腦”，每個虛字都有用法和意義的解釋，後面均附有例句。

• テ

包括兩個用法，一個是承上接下，相當於漢語中的“而”，是過去之助動詞，接於動形等詞連用言下；另外一個則作為斷語使用，如“テハイケマセン”，也表示動作的先後順序，加“ハ字以壯口氣”。兩者的意義區別並不大只有文法區別。

• ニ

ニ的用法共羅列了11種，現整理如下表

表 3

書中釋義	用法	對應的現代日語中的意義
於	名詞下動詞上	對象
在，於	用法如前	地點
向，到	動詞，代名詞下，動詞上，	目的地
當並	用法如前，他動	様ニ
变化	前自動，同ト	变化，ニナル
因	名，代名形容詞，動詞連用言	目的
當其時	同漢文“時”，動詞終止言下	目的
比較	名動詞之間	比較的物件
已過追言	名詞下	具體時間
未來預言	用法如前	具體時間（未來）
緣此	ヲ之变用，動詞下	表示原因

• ヲ

有三個意義，第一是處置事物，下接他動詞，即其一般用法。二是自字从字意，相當於“カラ”，下接自動詞，如“國ヲ離レテ”但是此項解釋並不準確，カラ只表示起點，但ヲ除了有起點的意思之外還有“通過”的含義。第三個則與第一種相同，表示動作，下接自動詞。但是作者舉的例句為“路ヲ歩キマス”，ヲ表示的是通過的場所、移動。

關於ヲ接自動詞的用法，上文提到的《語法指南》中的介紹則相對準確，“自動詞ニ係ルモノハ、其

50) 同注17

意義異ナリ、「國を去ル「人を別ル」ノ如キハ、よりノ意ヲナシ、「路を行ク「門を過グ」ノ如キハ、其動作ノ行ハルル地位ヲ示スマデナリ”<sup>51)</sup>。有可能本書的作者在接受日語教育時所使用的教材當中，關於ヲ的用法也沒有準確詳細的介紹。

• ハ

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區別事物，用於名詞之下，表示轉折或強調；第二個是者，是開口語，無意義，即現代語法中用來提示主語的用法。上述《語法指南》中對於ハ的定義則是“事物ヲ各自ニ差別スル意ノモノナリ”<sup>52)</sup>，可見本書的定義是參考了日本類似的文典，並對其做出補充以便中國人學習。

除テニヲハ外，作者對其他的虛字也列出做了說明，包括へ、と、ど、で、ぞ、も、の、か、が、や、ば、のみ、ばかり、だに、まで、さへ、から、より、とも、こそ、ながら、とて等，共計22個，分別釋義並舉例。

作者在虛字這一節的開篇指出虛字相當於中文的“之乎者也”，但其實這樣的對比並不準確。中文中“之”為結構助詞，“乎者也”三個均為終助詞，涉及到結構的問題，並不能直接對應日語的“テニヲハ”。但是作者只注意形式，並沒有進行分類，如“ニ”和“ガ”等接續詞同時具有格助詞的用法，在作用和意義上均有區別，作者並未對其進行具體分析。這應該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本身的局限性，並沒有意識到其區別，二是時代的局限性，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格助詞這樣的用法分類。儘管內容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這種先定義後舉例的編寫方式已經與現代日語教材相同，可以說這是本書所具有的先進性。

本書也是第一本從詞彙學角度對日語的語種進行介紹的教科書。當時的中國人對日語並沒有形成語言學的意識，因此這樣的語言學知識引入具備了一定的先進性。日本方面上述的兩部文典都未收入詞彙學相關的內容。作者“日本文字既有區別、言語亦不無分析”、“學日語者、何以異於是茲適分日本言語為四種、曰訓語、漢語、音語、新語”<sup>53)</sup>。作者將每類分別舉例，標注片假名讀音，下注中文釋義。其中訓語則按照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分類列出例詞。訓語為“日本本土語、雖個用漢字、而音與意亦有不同處”，如“入齒”、“押入”、“五月蠅”等，相當於現代日語詞彙學中的和語。漢語例詞主要為サ變動詞，“以下各語、加セシ、ス、スリ、スレ等字、但成動詞用之”，如“壓制”、“生活”等，基本是現代日語詞彙學中的漢語，也包括和制漢語在內。音語均為音讀詞，不屬於現代日語詞彙學中的任一分類。例詞均是サ變動詞詞幹，以和制漢語為主，如“安産”、“用心”等，其中也不乏在當時中國社會有違和感的“改良”這樣的詞彙。作者指出此類詞“假漢字音、而牽強其意以用之語也”。這是第一次中國人將中日詞彙形同意不同的概念寫入教科書。新語則是“近世西學盛行、所譯西書有不能以漢文譯者、乃用漢字、自造多語、其意與本字之意大相徑庭”，均為明治後期出現的新概念和新術語，如“肋膜炎”、“物質文明”等。

外語的學習必然涉及口語與書面用語之分，本書中作者也多次提及，更在此說明這樣的文白之分是學習的難點所在。

“若專恃日用會話之語與彼都之有學者酬答、不但己不能瞭解人之言、且見輕於人、言語之難、有是

51) 同注42 P93

52) 同注42 P99

53) 同注41 P63

如哉”<sup>54)</sup>

針對此，作者在最後一部分介紹了學習掌握日語的所需時間和學習方法。“學期”部分按照所需的時間按照具體情況分為三種，一種是在日學語學，以口語和聽力為主要目的，需要“三四月習日常用語、半載後多記名動等詞、習文法、學作文及書割等類、期年可聽東師講義”。第二種是“漢文深通或已通普通學者”，對於有這樣基礎的人“二三月學會話及虛字、半載後學文法、且廣搜名動等詞、期年小成、二年大成”。最後想要“究其國語、真正倭文”的人，則“非專學四五載、莫能貫徹”。作者注意到了日語中口語、書面語和國語學的不同，因此對於日語在學習時間方面的認識，比梁啟超在《論學日本文之易》中提出的“數月而小成、數月而大成”要更為科學一些。不過梁啟超提到日語中“漢字十之八九”，因此“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顛倒錯雜、瞽亂而兩無所成”，本書的作者也強調“用漢字十之五六、故學東文、必以通漢文為嚆矢”<sup>55)</sup>。這一點本書應該是借鑒了梁的觀點。但是梁啟超並沒有文體的意識，本書中提到“日本文體、別為數種”，而且對於漢字的比例，本書作者的描述也相對準確。“學訣”介紹了學習方法，即讀、記、聽，並以中國古代的小故事舉例說明了語境和練習的重要性。雖然作者的介紹很簡單，但這也正是我們現代外語學習所需要的幾個要素。這一部分內容說明了本書的作者是完全將日語當作一種外語來學習，並對其做出了較為科學的判斷。

#### 4.2.4單詞

卷二為詞彙和會話。詞彙（散語）按照意義分為天文類、時令類、數目類、顏色類、地類、宮室類、國名類、各國都城商埠類、方向類、人倫類、稱呼類、官爵類、人民類、身體類、形容動類、身動類、動作類、動作副類、動作成語類、言語類、性情類、品行類、人事類、應酬類、政事文牘類、文事類、武備類、商賈類、行店類、疾病類、喪葬類、外教（宗教）類、金寶類、衣服類、布帛類、飲食類、日用火類、日用水類、飲食炊口器用類、舟類、車類、居家器用類、雜器類、樹木類、物形容類和事理形容類46個項目，共計2124個詞。

漢字標注片假名，無切音。大多數下附中文譯文。未附有中文譯文的多為同形詞。也可推測有部分是找不到相應的中文詞彙對應。如“進步黨”、“風邪”等。

如凡例中“是書以華語譯東語”所示，《東語正規》也是日語檢索的形式，日文詞彙在先，後翻譯為中文。作者的翻譯較前兩本更為準確，如將“坐（スワル）”翻譯成“跪坐”。

雖然是按照意義分類，但動詞和形容詞兩個詞類有專門的項目。其中動詞分為形容動類、身動類、動作類、動作副類和動作成語類。收錄了一些常用動詞。但並不是本書所有的動詞都被歸在此類中。如“贊成”這樣的詞就被歸為言語類。形容詞分為物形容類和事理形容類，收錄了常用的形容詞。但作者的分类并不明确，如“是非”、“成程”“有れば有るほど”这样的副詞和短句都被收在其中，可见作者對於形容詞的品詞性也并未明确。

本書距離《東語簡要》和《東語入門》的出版時間分別相差16年和5年，因此本書中所收詞語可以體

54) 同注41 P66

55) 同上

現當時的時代性。

《東語入門》中國家名較少，而本書甚至將主要國家的首都以及中國的主要城市都列出來了。但也有如“市加哦”、“紐育”這樣的純音譯詞彙在其中，且作者並未翻譯為中文。而《東語入門》中的“義大利”在本書中則變成了“伊太利”這樣的日語詞。不知是作者在日語學校中所學，還是作者自己的記憶有誤。

《東語入門》中宮室類，官爵類詞語均為清朝機構名和官名。如“軍機處”，“內務衙門”等。本書則多為日本機構名，如“內閣”、“外務省”等。這也可以看出兩位作者所受的不同教育。陳天麟雖然在日6年，但並未接受日本的學校教育，隨父赴日應該多在公使館內私塾學習日語，因此接觸的詞彙也以公使館內常用語居多。而唐寶鏗和戢翼翬則接受了日本的系統教育，因此詞彙收錄也較陳更為新潮和“日式”。可以說，陳更偏重於在中國與日本人的交流，從中國出發收錄詞彙。而唐則是把在日生活的用語收錄進來，以日本生活交流為基礎編纂詞彙。所以我們可以說，《東語簡要》和《東語入門》面向的對象應該是在國內的日語學習者，而《東語正規》則偏向於準備赴日或在日的中國人，這一點在會話中表現得更為顯著。

《東語入門》中武備類詞語少於文事類，本書則正好相反。且本書中已經出現諸如“水雷艇”、“葡萄彈”這樣的新式武器名稱，甚至對兵種分類都有收錄，這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前兩本教材中沒有外來語詞匯，而本書中已經收錄片假名的外來語詞匯，如“ランプ”、“コップ”等。甚至在醫療類詞彙當中，也開始出現如“黑死病”這樣的新詞彙，宗教類也有“回回教”、“耶穌教”和“羅馬教”這樣的詞彙被收入。

《東語簡要》和《東語入門》收錄的詞彙和短語多為玩樂享受常用的詞彙，諸如花草，珍寶等詞彙數量相對貿易交流的詞彙就要多出許多，甚至也並沒有像本書一樣做出“商賣類”、“行店類”這樣的分類。

#### 4.2.5 會話與文章

會話按照用途分為日用語、燕居語、訪友語、遊歷語、慶賀語、弔唁語、賣買語、商業語、學校語、天時語、消遣語和辭別語18類，共計693條。

本書的會話內容更為充實和注重實用性。分類更細，涉及的範圍也更廣泛。會話和文章均不注漢語讀音，只標注片假名，這樣的編纂方式更為科學，而本書的日語也均為正確的日語表達。

在此書出版以前，中國也有許多日語學習用書，但是一般書籍都把日語當做中文看待，對於文字和語法內容沒有科學準確的介紹是必然的，在會話中也不考究日語助詞テニヲハ的用法。例如“你上哪兒去”這句話，通常成為“アナタ何處行ク”之類不正確的句子<sup>56)</sup>。但是本書中不僅助詞等使用正確，甚至時態、敬語、命令等形態的日語在其中都有體現。也使用了諸如“燕尾服（セビロフク）”、“ホテル”這樣的新詞和外來語。比起前兩本的隻言片語，本書的會話按照場景分類，有單句的，也有長篇會話。如“燕居語”中收錄有完整的生活日常會話，涉及洗漱、吩咐下人等內容。

如上文所述，本書面向的學習者是準備赴日或在日的中國人，因此許多會話內容是以日本的生活為場景的。如：

56) 實藤惠秀 (1970) 《增補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 くらしお出版社 P40

“アナタハ何ナ船ニオ乗りナサイマス（你坐甚么船）”

“西京丸ニ乗ります（坐西京丸）”

“人足ヲ二人呼ンデ下サイ（给我叫两个挑夫来）”

“此レ等ノ荷物ヲ横濱ホテル迄持ッテイッテ下サイ（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横滨西洋客栈里去）”

卷三為短文和文章。包括語訣、人事六則（潔身、起居、擇友、節用、修身、前車可鑒）、史事三則（郭巨、陸續、司馬溫公）、雜談四則（兵商並重、野蠻略述、德使遇盜、英國工人會規）及附錄泰西哲十三則（立志宜堅、勿過疑慮、勿畏謗言、勿望報施、不知不慍、勿盜虛聲、勿多疑心、勿驚虛僞、勿耽間居、愛眾親仁、深謀遠慮、悲宜中節、性理宜講）。

本書是第一本清人編纂的有短文和文章的日語教科書，其中有教人修身養性的文章，提倡忠孝，如史事三則。不過這三篇文章並不是路人皆知的經典，日本的教科書或者教育系統應該不會收錄這樣的小故事，但並不能就此判定是作者翻譯的作品。還有一些對國家政治和經濟上的看法，如“兵商並重”、“英國工人會規”這樣十分具有時代性的內容，目的應該是出於序言中所說的“思謀輸入東邦文明”。還有一些他國時事，如“德使遇盜”。文後多有一兩句評論，無法確定是作者的感想還是原文中就帶有的。

附錄為《泰西哲十三則》，作者是“英國若莫斯登先生”。從本書的出版時間和出版地來看，這一部分應該是從英語翻譯為日語，被作者再翻譯為中文收錄進本書的。

這本教材是舊形式向新形式的過渡，如散語的分類方式，在保留舊的形式的基礎上添加新的類別。因此這是一本由掌握扎實日語知識的中國人獨立完成的，承上啟下的日語教材。此書對日後的留學熱潮也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使得有心赴日和學習日語的中國人能夠以相對科學的方式學習。

## 5. 綜述

上述三本日語教材的編著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都曾經到過日本，掌握一定的日語基礎，這一點保證了書中所載日語的正確性比以往的記錄日語的書籍有所提高。這三本教材反應了當時中國人日語學習目的的變化，以及部份知識份子對日語認識的進展。玉燕編纂的《東語簡要》大量參考了《吾妻鏡補》的內容，儘管收錄了一些當時的新詞，但是玉燕應該並沒有受過正式日語教育，因此並沒有日語的文字意識。雖然沿襲了舊的編纂方式，但是作者已經意識到在貿易上若中國人不懂日語則會造成與日人交流不便，即日語的功能性。相對以往將日語作為方言收錄的日本相關書籍，這本書在這一點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性。陳天麟自幼隨父赴日六年，儘管在日學習日語，但並沒有進入正式的日本教育系統。因此《東語入門》雖然在語言上更為準確，卻也不能算作是外語教育的正式教材。但是陳天麟在書中收錄了更多實用性的會話內容，並提及通過日語學習日本文明，將日語的功能性更為擴展。而《東語正規》是清人在日本接受正式日語教育後編纂的教科書，因此是日本教育系統下的產物。這在中國人學習日語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本。可以說這本教材已經具備了日語教材所需要的幾個要素，可以作為清人學習日語的正式教材來使用。尤其當時赴日熱潮已掀起，因此作者面向的是赴日留學的中國人，期待這本教材能夠幫助他們掌握正統的日語，能夠在日交流生活。除了這樣的功能，作者還期待能夠通過掌握正確的日語，更好更快地吸收

日本的新知識。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帶來一種新的外語教育方式。作者所在的日本學校，教師們也在思考如何教授外國人日語，因此從教授方法到教材，都會有新的嘗試，而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在《東語正規》中也都有所體現。

從這三本書可以看出部份知識份子對於日語知識掌握情況的變化。《東語簡要》和《東語入門》單詞的收錄方式相近，前者沒有中文譯文，而後者也並沒有意識到一些詞語在意義上的微妙差別，加上作者對於漢字的認識不足，因此在翻譯上並不準確。而《東語正規》中不僅對於日語語言學知識的介紹相對完整，甚至能夠將“スワル”這樣的詞準確翻譯為“跪坐”，這說明作者具備了相應的日語知識。中國人對日語的記錄，從單純的方言收錄，演變成為了外語教育的形式。同時外語教育作為一個學科，是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教科書對外語教育學得建立是不可欠缺的存在，但是嚴格地說，清末西洋語言，特別是英語的教科書，並不能包含在現代外語教育學的範圍內。儘管同文館的英語教育比日語教育早，但是並沒有語法相關的書，也並沒有正式的教材，因此對學習方法或語言分析的調查就變得困難了。另一方面，日語方面則留下大量的教材，使得其相關研究就有了很大的可行性。這三本教材在短短16年間就從簡單的單詞收錄過渡到了正式外語教材的形式，可以說是清末中國人學習日語的歷史進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儘管如此，當時中國人學習日語的人數仍然相對較少，加上研究日語並不深入透徹，日語教材還是主要由日本人編著。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如坪內雄藏（1901）的《和文漢譯讀本》，松下大三郎（1901）的《日本俗語文典》等等。這些書是由日本人針對中國人學習日語而編著的教材，雖然有品質保證，但是日本人並不能完全瞭解中國人的語言習慣，以及找到一種真正適合中國人學習日語的方式。而作為一個國家的外語教育，也不可能完全依賴於外國人來編著教材，制定學習方法。因此中國人自己編著日語教材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這三本教材為後來的日語教科書也提供了參考的範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實藤惠秀（1970）《増補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社P60
- 沈國威（2010）《日語難嗎？——以近代初識日語的中國人為說》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43輯
- 玉燕（1884）《東語簡要》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 福島邦道（1993）《日本語館訳語攷》笠間書院
- 翁廣平《吾妻鏡補》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 陳天麟編譯（1895）《東語入門》載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語文學研究室編（1968）《纂輯日本譯語》京都大學國文學會發行
- 實藤惠秀（1942）《中國人の日本與研究》國語文化講座6《國語進出篇》朝日新聞社
- 黃遵憲（1887）《日本國志》載於《黃遵憲全集下》（2005）中華書局
- 內田慶市（2009）〈ピジン——異言語文化接触における一つの現象〉《言語接触とピジン》東京 白帝社
- 劉建雲（2005）《中国人の日本語学習史——清末の東文学堂》學術出版会

- 沈國威（2010）《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享》中華書局
- 唐寶鏗、戢翼翠（1895）《東語正規》實藤文庫
- 落合直文、小中村義象（1893）《中等教育日本文典》東京博文館
- 馬建忠（1983）《漢語語法叢書——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
- 大槻文彥（1891）《語法指南》收錄於北原保雄、古田東朔編《日本文法研究書大成》勉誠社
- 王宝平（2005）《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汲古書院
- 汪婉（1998）《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
- 酒井順一郎（2010）《清国人日本留學生の言語文化接触——相互誤解の日中文化教育交流》ひつじ書房
- 李小蘭（2002）〈清末日語教材之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
- 梁啟超（1989年3月版）《飲冰室合集》卷四之《論譯書》中華書局

